

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张文俊 高志霏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DOI:10.12238/as.v8i11.3451

[摘要] 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难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同时人才与技术的瓶颈也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云南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本文将从云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探索出发,分析其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以期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创新发展; 必要性; 实践策略

中图分类号: G812.42 文献标识码: A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Path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Wenjun Zhang Zhifei G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raditional model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currently encountering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are increasingly unable to meet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rural progress in the new era. This issue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wher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disparities persist, and constraint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further impede the growth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In response, Yunnan Province has undertaken practical initiatives to promot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it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paper examines Yunnan's empirical experiences,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in this domain, and explores feasible pathways for implementation, aiming to provid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strategic references for other regions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Necessity; Practical Strategies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关键支柱,其创新发展已成为时代赋予的紧迫使命。传统发展模式在应对新时代农村变革时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人才短缺与技术滞后更是成为制约集体经济跃升的双重枷锁。云南,这片多彩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实践探索,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开辟新径,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可能。本文旨在深入剖析云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实践,提炼其成功经验,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

1 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1.1 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受限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要素配置失衡,导致农产品附加值难以提

升。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剧,留守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传统耕作方式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此外,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抗风险能力薄弱,难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要求。传统经营模式下,农业生产多依赖经验判断,缺乏科学规划与标准化管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对接机制,农产品常面临滞销或低价竞争的困境,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收益空间。此外,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弱化,对生产要素的整合能力不足,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优势,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

1.2 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

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各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的差异,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高原山区与坝区之间、边境民族聚居区与内地

区之间,在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选择空间和市场化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部分民族地区受限于交通闭塞、信息滞后,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而另一些地区则依托特色资源优势,通过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或特色种植养殖业实现了集体经济的突破。这种发展不均衡不仅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也影响了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此外,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习俗和生产方式差异,进一步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复杂性,对政策落地和资源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1.3 人才与技术瓶颈

当前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人才短缺与技术滞后成为关键制约因素。一方面,受城乡发展差距影响,农村地区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专业人才,尤其是既懂农业技术又具备市场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导致集体经济项目在策划、管理和营销等环节缺乏专业支撑。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应用水平较低,部分地区仍依赖传统种植养殖方式,对现代化农业技术、数字化管理工具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不足,制约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品附加值开发。此外,技术培训体系不完善,农民获取新技术、新知识的渠道有限,进一步加剧了技术瓶颈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2]。

2 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2.1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在红河州的落地成效

在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现实逻辑与路径探索中,“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在红河州的实践成效尤为显著,成为破解民族地区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红河州作为多民族聚居区,传统农业经营模式长期面临组织化程度低、市场对接能力弱等问题,而该模式通过党支部引领、合作社统筹、农户参与的三方联动机制,有效激活了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以红河县甲寅镇为例,当地党支部牵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整合全镇12个行政村零散土地资源,引入“订单农业”模式,与昆明、成都等地的生鲜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2022年,合作社通过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和冷链物流服务,带动农户种植辣椒、番茄等高附加值作物,实现亩均收益从传统玉米种植的1200元提升至4500元,全镇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62%,达到380万元^[3]。

从机制设计层面分析,“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核心在于构建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的梯田红米产业案例具有典型性:党支部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设定每公斤红米最低收购价较市场价高15%,同时将合作社30%的利润用于反哺村集体公益事业。2023年,该镇红米种植面积扩大至2.3万亩,带动农户4200户,其中脱贫户占比达38%,户均增收1.2万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合作社引入“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升级版模式,与云南白药集团合作开发红米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后,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500万元,较单一种植模式增长3倍。

在制度保障层面,红河州创新建立的“三会一课+合作社议事”双轨制,确保了党支部政治引领与合作社市场运作的有机统

一。建水县西庄镇的案例显示,通过将党支部会议与合作社理事会合并召开,重大决策需经党员代表、合作社理事和农户代表三方表决,2022年该镇集体经济项目决策效率提升40%,而农户满意度达92%。此外,红河州财政局设立的“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对采用该模式的合作社给予每亩500元的补贴,累计投入资金1.2亿元,撬动社会资本3.8亿元^[4]。

2.2 数字化赋能

在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数字化赋能已成为破解传统发展瓶颈、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区,通过构建“智慧农业云平台”,将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集体经济组织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数据驱动、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集体经济增收新模式。以洱源县凤羽镇为例,该镇2021年投入800万元建设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集成土壤墒情监测、作物生长模型、市场供需预测等功能,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12个村集体合作社的3.2万亩农田数据,结合AI算法生成精准种植方案,使水稻单产从420公斤/亩提升至480公斤/亩,年节约灌溉用水30%、化肥使用量15%。平台还嵌入“集体经济数字账本”模块,实现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的透明化管理,2022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42%,其中数字化服务占比达28%。

大理智慧农业平台的创新实践,本质上是将“数字技术”转化为“集体经济生产力”的制度性突破。平台通过“党支部+数字企业+合作社”的联动机制,引入阿里云、云南农垦等科技企业作为技术支撑方,与村集体签订数据服务协议,按收益的5%提取技术分成,既保障了企业持续创新动力,又避免了集体经济“技术依赖症”。例如,宾川县鸡足山镇的葡萄种植合作社,通过平台对接全国水果批发市场数据,动态调整采摘周期和定价策略,2023年错峰销售使每公斤葡萄溢价1.2元,带动集体经济增收120万元。

2.3 资源入股与文旅融合:丽江纳西族村落通过民宿经济激活集体资产

在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浪潮中,丽江纳西族村落凭借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文化底蕴,探索出一条以资源入股与文旅融合为核心的民宿经济发展路径,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集体资产。丽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其纳西族村落不仅拥有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群落,还承载着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资源为发展民宿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以玉龙县白沙镇为例,当地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将闲置的纳西族传统民居以评估作价的方式入股至村集体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引入专业民宿品牌进行管理^[5]。

从理论层面分析,丽江纳西族村落的民宿经济实践契合了“资源诅咒破解理论”与“文化资本转化模型”。传统观点认为,资源丰富地区易陷入“资源诅咒”,即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忽视其他要素的开发,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而丽江的案例表明,通过将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软资源”转化为可经

营的经济资产,不仅能规避资源诅咒,还能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例如,纳西族传统民居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建筑特色,以及东巴纸坊、纳西刺绣等非遗体验项目,成为民宿吸引游客的核心卖点。此外,文化资本转化模型强调,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需经历“符号化—商品化—资本化”三个阶段。丽江民宿经济通过将纳西文化符号(如东巴文字、纳西服饰)转化为可消费的商品(如文化主题客房、手工艺品),再通过品牌运营实现资本增值,完整演绎了这一模型。

丽江纳西族村落的民宿经济创新,还为云南多民族聚居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样本。其核心经验可概括为“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丽江市民宿管理办法》、设立民宿发展专项资金、开展“民宿星级评定”等措施,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避免直接干预市场运营,确保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二是坚持文化保护与开发并重。在民宿改造中,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纳西民居的原始风貌,同时引入智能安防、地暖等现代设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三是坚持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企业”的四方联结机制,明确各方权责:村集体提供资源入股,合作社负责统筹协调,农户以房屋或资金参股,企业承担运营风险^[6]。

3 创新机制设计与制度保障

3.1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构建“政府+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企业”五方协同体系,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政府负责政策引导与基础设施配套,村集体以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合作社承担组织协调职能,农户通过房屋租赁、劳务输出等方式参与,企业投入资金与技术并承担市场风险。该机制通过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建立动态收益分配公式(如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既保障农户基本收益,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形成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闭环。

3.2 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资产监管体系

通过明晰集体资产权属关系,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框架。一方面,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专项行动,对土地、林地、房屋等资源性资产和经

营性资产进行全面登记造册,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数字化管理;另一方面,构建“县乡联动+第三方审计+村民监督”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在县级设立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乡镇配备专职监督员,定期公开资产运营状况,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同时,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通过量化折股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激活沉睡资产的经济价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是应对传统模式困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民族地区均衡发展、突破人才与技术瓶颈的关键路径。云南的实践探索表明,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协同机制、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赋能以及文旅融合的资源活化,能够有效激活集体资产的内生动力。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监管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与创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沈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及创新路径探析——以安庆市宜秀区为例[J].数字农业与智能农机,2024,(6):16-18.
- [2]赵琳,周砚冰.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答卷”[J].云端,2024,(24):141-143.
- [3]张晓婷.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J].中国集体经济,2024,(10):9-12.
- [4]魏春艳.跑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加速度”[J].村委主任,2024,(06):155-157.
- [5]朱睿博,孙春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与金融支持:实践案例、问题及建议[J].西南金融,2023,(12):54-66.
- [6]王浩宇.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3,29(12):136-139.

作者简介:

张文俊(1984--),女,云南宜良人,硕士研究生,林业工程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研究。

高志霏(1991--),女,云南禄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发展研究。